

# 吳偉克(Galal Walker): 全英語世界中第一位榮獲 " 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 " 的人

採訪者:李敏儒

〔伊利華報編者按〕吳偉克教授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中文部正教授、美國教育部資助的全美東亞語文資源中心主任、康乃爾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二十多年來，他致力於中文教學法的研究，創立了“體驗文化教學法”，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建立了中文教學法博士點。他創辦的全美東亞語文資源中心，是全美唯一的專注於中日韓文教學研究的中心，為在美國普及推廣中文教學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熱衷於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創建了“中美紐帶”項目，每年帶學生來中國學習、實習。他還大力支持美國中小學中文教師的工作，支持當地華裔中文學校的各項活動。由於他對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貢獻，於2003年獲得了中國教育部頒發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這是中國教育部向國外漢學家、漢語教學專家以及對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做出突出貢獻的國際友人頒發的最高榮譽獎項。他是第一個獲得該項大獎的美國人，也是全英語世界的第一個獲獎者。

自2003年後，吳教授的中文教育事業更有長足的發展。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建立了有碩士班和中小學兩個層次的“中文旗艦工程”，在全美國起着領航的作用，並由此組織了一支有王建琦教授、簡小濱教授、史昆主任、宗菲倩經理、趙奕奕老師、李敏儒老師等組成的精幹的團隊。他的學生裴贊(Patrick McAloon)獲得2004年《漢語橋》比賽一等獎，安迅(Abigail Southerland)，喬哲輝(Josh Lotz)分別獲得2006年和2007年《漢語橋》比賽一等獎。分組的觀衆在慶祝春節、中秋的活動中，都能欣賞到旗幟工程學生用中文表演的精彩節目，看到他們作義工的身影。同時，在中小學旗艦工程的努力下，俄州開設中文課的中小學在去年增加了三倍。本報為吳偉克教授及其團隊的杰出貢獻而感動，特地登出李敏儒博士對吳教授的採訪稿。

李敏儒博士，湖南長沙人。四川大學中文系碩士，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系博士。曾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亞語系任教，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當過訪問學者。現任全美東亞語文資源中心主任助理。受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外漢語教學動態》刊物委託，他採訪了吳偉克教授。訪談原文是英文，由他編輯、翻譯成中文。本報有刪節。

李：祝賀您獲得中國教育部頒發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當您聽到這個好消息時，您的感受如何呢？

吳：我感到十分驚喜，感到很榮幸。中國教育部對海外的漢語教學和研究如此重視，這是非常好的事。我認為授予我“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不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表彰，更是對海外漢語教學工作的表彰，對我工作二十多年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表彰。

李：您說您感到驚喜，在過去您是否期盼過有這麼一天您會獲獎呢？

吳：在我所從事的領域，獲獎並不常見。我之所以努力工作，是想對漢語教學領域做點貢獻，使之有所革新，有所進步，鼓勵更多的人來學中文。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期待過會獲獎。在過去，人們也曾讚揚過我所作的一些項目。至今為止，這是我學術生涯中所獲得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一個獎。

李：我知道獲這個獎對您來講極為榮幸。今年全世界只有六個人獲這個獎，全美國只有一個，而且您是英語世界中第一個獲得這個獎的人。能否告訴我三十年前您為什麼會選擇中文這個專業呢？

吳：我大學本科是在德克薩斯大學念的，專業是經濟和語言學。我在本科的時候開始正式選修中文，但我當時的目標是學法律，當律師。我讀三年級的時候，我與許多律師談過話，也作了一些調查，覺得律師並非我的理想職業，有許多當律師的人並不快樂。大學畢業時，我收到了康乃爾大學研究生院的錄取通知書，並拿到了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我選擇了中國文學。

李：您說最開始您的專業是經濟學，為什麼您從經濟學轉到文學了呢？

吳：經濟學是為上法學院做準備。我的另一個專業是語言學，這樣，學點中文和文學是順理成章的事。另外，我的家庭背景對我選擇經濟學也有關係。我的祖父對階級鬥爭理論、工人階級的權益等問題很感興趣。在他的影響下，我從小就關注社會的經濟問題。所以學經濟學也很自然。但當我念研究院的時候，我不想學經濟學了，也不想念語言學，而想讀文學。因為語言學的例句枯燥無味，而文學的語言美妙無比。老實說，當時我也沒有多少清晰的概念我將來要做什么。那時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現在的情形大為不同。當時我們那一代人，選擇專業，有的憑自己的興趣，有的出於對社會的關心。我想學習中國文學，主要是想更多地瞭解中國，瞭解中國文化，我覺得學文學會幫助我達到以上目的。

李：您在念本科之前學過中文嗎？什麼時候開始的？

吳：那還是我參軍，被送到越南的時候。我的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一些說普通話的中國人。在和他們交往的同時，我學了一點普通話，他們看來也很願意教我。在越南的時候，我很年輕，比我的同伴都年輕。中國人想學英文，我想學中文，有共同點，所以我覺得很容易與這些中國人溝通。

李：您說選擇專業也出於對社會的關心，是關於哪個方面的呢？

吳：我在越南的時候，看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事在發生。我開始了對國際事務的思考，當然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而且，從我年輕時候起，我就喜歡閱讀。十二歲到十四歲時，我幾乎讀遍了能找到的林語堂的所有著作，比如說，《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快樂的天才》、《蘇東坡》等。林語堂的作品讓我看到了一個我不曾接觸過的世界，深刻而豐富。我從來沒想到林語堂的作品對我一輩子的生活有這麼大的影響。它使我認識到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性，認識到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瑰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李：您的家庭環境可能對您的選擇也有一定影響吧，比如說，您提到您的祖父。

吳：對。我的祖父是個很有趣的人。他出生於蘇格蘭，年輕時是個水手，大概在二十年代時來到美國。他二十七歲時還是個文盲，他決定學習，自己掃盲，因為他覺得要在美國生活，非要有文化不

可。只要你努力，總會有機會成功的。後來，經過不懈的努力，他成了一個出版商。我的祖父在政治上屬於激進派。他是當時“世界產業工人協會”，一個左翼的社會主義組織的活躍分子。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五十年代，每個人都害怕被戴上“共黨”的帽子，而我祖父在登記的時候，卻填上“共產黨員”。(笑)我知道他不是“共黨分子”。但他就是要表示他不怕鎮壓，敢於表達不同的意見。後來有人告訴我，在科羅拉多州，全州就只有我祖父一人填了“共產黨員”。

李：(笑)你祖父“入黨”還挺早的。看來他的獨立思考，敢於走自己的路，對您有所影響，是嗎？

吳：對。我覺得我的祖父對我影響非常大。

李：在您被俄亥俄州立大學聘用的時候，您是作為文學教授被聘請的，怎麼轉到語言教學與研究上呢？

吳：我在康乃爾當講師的時候，教的是中文，在賓州大學工作一年，也是教中文。我一九八一年來俄亥俄州立大學時，根本沒有教語言的教授職位。當時只有教文學，搞文學研究才被認為是嚴肅的學術工作。但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有些事引起我的深思。我注意到學生花了成倍的時間和精力在學中文上面，比學法文，西班牙文所花的時間多得多，但是收效並不理想。另一方面，從我自己學中文的經驗得知，當時的教中文的教學體制實際上阻礙我學我應該學的東西，比如說，老師對口語不重視，只重視書面閱讀和學術研究，不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交際能力的培養等。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新的語言教學體制，使中文教學更聯繫實際，更有成效。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容易。我在這領域工作了二十多年了，發覺實際上是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李：在中文教學法領域，現在和過去相比，有哪些變化呢？

吳：在八十年代初，根本就沒有中文教學法這個領域。如果你去看看當時的《中文教師協會會刊》，你就會知道，當時刊物上全是關於文學和語言學的文章。怎樣教一個成年人，一個純粹的老外學中文？為什麼許多學中文的學生，學了幾年就放棄了，很少有人達到高級的能自由運用的程度？學術界對此很少有深刻的有系統的思考與討論。

李：現在情況怎麼樣？

吳：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八十年代初到現在，語言教學法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已確立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教學界對口語教育越來越重視了。許多教學法專著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在討論研究之中。儘管有不少語言教師仍然不做研究，以為懂所教的語言就能教好那門語言，但很多人在研究語言教學的原理和方法，把重心從以教師為主轉到以學生為主，使學生在中文學習上所花的時間和所作的努力卓有成效。

李：我知道您在中文語言教學法的兩個領域里有所建樹：一是高級中文的教學研究，另一是“體驗文化”教學法。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

吳：高級中文教學主要是教什麼樣的學生，怎樣教學生。作為一個教語言的老師和主持語言教學項目的負責人，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學生，也就是說，學生學了中文以後做什麼。美國學生學中文出於不同的目的。有的是出於傳教的需要，傳播自己的宗教或文化。比如說，宗教傳教士，他們學習外語的目的是傳播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們只需要用當地的語言去翻譯他們的信念，他們自己的信仰則越純正越好。我也見到不少中國來的武術師，他們的目的是弘揚中國武術，他們教人中國功夫，但並不熱衷於學習西方的文化。他們是我所謂的文化傳教士。有些人學語言是為了當外交官，代表政府。出於政治的需要，他們試圖用當地的語言來表達他們政府的立場與觀點，這也近似於傳教士。我想培養的不是以上幾類學生。

李：我想培養的高級中文程度的學生是這一類人：他們渴望到中國去，從事工商業，從事經濟貿易，從事文化教育交流等活動。他們渴望瞭解中國。

我們需要培養這樣的人才，就需要有非常清晰的觀念。要訓練他們懂得怎樣和中國人交流。他們必須懂得和中國人打交道的基本技能和策略，他們必須能讓中國人和他們講話時感到自在隨意。這些人到中國去是為了和中國人做生意，作合作項目，或是做合資企業。這些人去中國是為了向中國學習，學習中國針灸，中國藝術，文學等。美國學生去中國，應該訓練自己具有很好的交際能力，應該去瞭解中國人怎麼看世界，怎麼解釋世界。這些你只能從中國人那里學，甚至只有到中國才能學得到，在絕大多數語言教科書上是學不到的。

李：我的理想是，培養能夠理解中國的學生，特別是和中國人意見觀點不同的時候。即使我們不同意他們的想法，我們也應該設法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會這麼想，儘量瞭解他們的文化根源、文化視角和世界觀。我總是教導我的學生，到中國去，不是去教導中國人應該怎樣生活，而是去儘量學習，去理解另一種文化，反過來加深對自己文化的瞭解，甚至對自身的理解，從而創造一個和諧和包容的世界。我不希望我的學生到中國去指手劃腳，指示人家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做。就語言文化教學而言，培養出那樣的學生，那是最糟糕的一種結果。

李：我相信您的理想能夠實現。那麼，什麼是“體驗文化”教學法呢？

吳：設想你如果去教美國學生，十七八歲的美國學生學中文，如果你帶他們到中國去學習，去與中國人建立平等友好的關係，那麼，他們要學的，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我認為，是文化。是語言交流中所體現的文化。他們必須理解文化的作用，瞭解文化怎樣體現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交往之中。而且他們必須理解他們自己生活中的文化要素，文化怎樣幫助形成他/她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認為，文化是一種生存方式，是人類在生活中製造意義的方式。我們要讓學生認識到文化

之間的不同和差異。

李：那麼，怎樣將以上的想法付諸教學實踐呢？

吳：首先，我們將文化具體化為一些具體場合。我們要學生做的不是去讀教科書，那樣只會得到對文化的詮釋，而不是運用。我們指導學生去體驗另一種文化，設身處地的去想問題，去和别人交流，去不是僅僅只學發音、造句。在體驗中學習，是我們的主要學習手段。作為老師，我們所作的是安排這樣的場合，創造這樣的機會讓學生練習，“在體驗文化中學習語言”。

李：這很有趣。我聽說您正在做一套多媒體中文教材，這套教材和傳統教材有何不同？怎樣體現您的上述觀點呢？

吳：有許多不同。首先，關於語言教材的觀念不同。作為印刷品的教材，在我們多媒體中不再佔主導地位。我們在教語言的同時教文化，可以充分利用現代科技的有利條件，即利用多媒體，聲音、視覺圖像等，將它們結合在一起，讓學生觀察中國人是怎樣交談的，聽到聲音，看到具體的情境，從而儘量參與這種交流。教學的重點變成了去聽，去看，不再是單純的閱讀教材。印刷品的教材，它的作用被削弱了。我們首先編的是聽力教材，學生首先要聽懂，懂得對話發生的情境。其次是視覺教材，學生能夠看到語言交流發生的情境，在什麼樣的場合中使用什麼樣的語言。最後才是印刷品教材，學生有書本來幫助他們理解。

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口語教學，而且在閱讀教學中同樣有用。閱讀，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聽力技能和形象思維技能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最近在這方面有許多研究成果，學者發現，在進行中文閱讀訓練中，語音系統的訓練極為有益。

另一個不同點是：過去大多數教材是為老師編寫的，老師用這些教材來幫助他/她備課。我們的多媒體教材是為學生編的。學生可以用它來自學。多媒體教材與傳統教材有很大的不同，而這是現在乃至今後十年二十年外語教學教材發展的方向。

李：謝謝您的介紹。聽說您在課堂教學中也作了改革，有哪些方面呢？

吳：我們首先給學生很多材料，情境的介紹和對話等，包括聽力材料和視覺材料，要求學生課前預先準備。上課時，老師會佈置一個體驗文化的場景，學生來到教室，參與這種場景，將他們準備好的東西表演出來。老師給他們講評，每天給他們打分。在一年級，我們沒有期中或期末考試。我們許諾學生，如果你每天準備，每天練習，到期末你在一些情境中就能運用中文交流。我們天天和學生在一起，天天打分，知道每個學生的情況，所以我們用不着有期末考試。到了中級或高級班，我們開始有考試。因為大多數學生會到中國去學習，而中國很重視考試，所以我們要訓練我們的學生適用中國式的考試。

李：您的話使我想起了中國教育界正在進行的改革，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

吳：我們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素質教育。我們的培養美國學生的目的不是為了參加漢語水平考試，儘管到中國留學，去拿中國學位，漢語水平考試很重要。我們的學生學中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跟中國人交流。

我的目標是幫學生打好堅實的基礎去中國學習，然後在中國公司工作，或是做代理，或是做社區輔助工作。總之，在中國社區中工作，他們的同事是中國人，他們的老闆是中國人。他們要學習中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理解作決定的過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美國人向中國學習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別在目前這一歷史階段。

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時期。中國正在經歷着巨大的變化，就速度、深度和廣度來說，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歷史上任何時代都無與倫比的。一個美國學生要瞭解這一點，他/她就必須到中國去，親身體驗這種變化。向普通的中國人民學習，瞭解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我的理想就是想讓學生直接和中國人交流，拜願意教他們的中國人為師。我不滿足於只讓我的學生參加專為外國學生舉辦的中文班，儘管這很重要，是值得走的一步。我的學生非常清楚他們為什麼來中國，他們來中國不是做傳教士的，而是來向中國學習的。中美文化之間對待人際關係有一些基本的甚至是互相衝突的不同點。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對此加以注意，能理解這種不同，能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來體會，處理人際關係。要理解這兩種文化的不同，美國學生必須要接受訓練。許多情形，對懂中國文化的人是明擺着的事，但對於只懂美國文化的人來說，他們就理解不到其中的意義。

李：您能否給我舉個例子？

吳：比如說，中國人作東，請美國人作客。儘管兩個民族都好客，都對客人很友好，但對主人和客人的期待很不一樣。中國人講究“客隨主便”。這意味者，主人費盡心思作了許多安排，客人只要按着主人的安排辦就行了。而在美國，情形恰好相反，主人應該提供客人許多選擇，讓客人作選擇，作決定。這可以說是“主隨客便”。所以當中國人請美國人作客時，美國人按照他們的文化觀看問題，覺得主人為他們做選擇和決定，剝奪了客人選擇的自由，似乎主人將一些東西強加於客人。他們不滿意，希望有自己的要求和選擇。而從中國主人的角度看，我做得那麼辛苦，還得不到好評，抱怨美國客人不好伺候，要求太多。(笑)

李：當老師的就要訓練美國學生理解這種文化現象，適應中國文化。告訴他們要在中國做一個受歡迎的好客人，就應該讓主人感覺良好，要讓主人覺得他這個主人當得非常稱職，為客人作了正確的選擇和決定。(笑)這看起來很容易，簡單，但我的美國學生做起來覺得不容易，特別是要要求他們改變立場，發自內心的覺得滿意，欣賞中國主人的行為方式。

李：您舉的例子很有趣。

裔在美學中文的想法。

吳：華人大後代學中文是美國中文教學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後者許多語言學系和教育系都有這個學位授予權。中文教學法是研究語言及其知識是怎樣在不同文化中傳輸，或者在外國文化中(比如中國文化)，或者是在中美文化間。我的博士生必須很有創造性。他們必須要掌握各種各樣的知識，要有很好的人文科學的背景。

李：您很高興地看到哥倫布市建立了中文學校，看到全美中文學校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看到許多華人活躍在這個領域，作了很多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是非常好的事，值得其他的美國人學習。

李：正像您所說的，您喜歡創新，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您建立了全美第一個中文教學法博士點，能告訴我們一些這方面的情況嗎？

吳：中文教學法學位和教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位不同，後者許多語言學系和教育系都有這個學位授予權。中文教學法是研究語言及其知識是怎樣在不同文化中傳輸，或者在外國文化中(比如中國文化)，或者是在中美文化間。我的博士生必須很有創造性。他們必須要掌握各種各樣的知識，要有很好的人文科學的背景。

李：比如說，我一個學生剛完成她的博士論文，拿到學位。論文題是中國歷史上的閱讀方法。她很有趣的發現：在中國古代閱讀被看作是社會文化事業。她總結出中國古代老師是怎樣教的，知識是怎樣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另一個博士生正在研究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傳輸，下一代的人怎樣學習、繼承傳統。還有一個學生，在研究中文高級程度學生的定義，這似乎很簡單。但一旦細緻研究起來，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李：除此以外，您還創立了“全美東亞語言資源中心”，這是美國唯一的專注於中文教學研究的資源中心。能簡單介紹一下該中心的宗旨及現況嗎？

吳：該中心是美國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項目，支持並贊助國際語言文化交流。本中心的宗旨是發現、發展新的途徑和方法來促進、鼓勵美國人學中文、日文、韓文。為實現這一宗旨，我們辦了教師培訓班，有出版教材、專著、多媒體材料的出版社，還有許多項目，試圖開發新的教學模式的材料和新的教學方式，比如剛纔說的編寫多媒體教材，還有遠程教學。利用遠程教學，我們的中文教學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只要願意學中文，人們就可以上網學習。

李：剛纔您提到教師培訓，您有沒有打算和中國國內有關方面合作來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呢？

吳：當然有。我的桌上就有這樣的計劃。我們正在考慮在中國建立教師培訓中心，看看我們的“體驗文化”教學法能不能對中國老師有所幫助。同時也正在和中國有關方面洽談，看能不能介紹中國老師來美國培訓美國的中文教師。總之，文化交流對中美雙方都有益，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廣闊的。

李：我想問一些私人方面的問題。您是美國人，您的夫人是日本人，你們最近領養了一個中國女孩，是您的老鄉，湖南人。可謂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國際家庭。你們家裏有文化衝突嗎？

吳：我的家確實是個國際家庭。我太太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系日文部教授，我們經常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但我們家裏能夠保持和諧和安寧，沒有什麼文化衝突，因為我們儘量去理解對方，理解對方看問題的角度和立場，互相尊重對方的文化，學習和不同的文化互動。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試圖改造對方。我太太讓我行我道，讓我按照美國人的方式生活。我也是如此對待我太太。當然有時候不是特別舒服，有些事一種文化認為特別重要，但在另一種文化看來就無所謂。但我們學會了容忍，學會了互相理解，和平共處。

李：我們的女兒是從中國來的，正在學三種語言。她媽媽對她講日文，她的課外輔導老師是中國人，對她講中文，我呢，有時講中文，更多的時候對她講英文。我無法肯定今後她講三種語言的能力到底會怎樣發展，但我可以肯定，這三種語言對她來說都很熟悉。她很幸運，在這種多元語言文化環境成長。我希望她能尊重理解她母親的日本文化，我當然也希望她尊重並理解我的美國文化，我更希望她能夠儘可能的學習有關中國的知識，為她有這樣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遺產而驕傲。我希望我的女兒知道怎樣和不同文化的人和和睦相處，到中國去知道怎樣和中國人交流，長大後能夠對多元文化作貢獻。

李：我相信您的女兒作為一代新人，肯定不會辜負您的期望。現在不知不覺，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我知您今天下午還有一個會，我想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您對中美關係的看法。

吳：長期以來，我和中國的關係局限於私人和文化交流交流的領域。作為美國公民，我對政府之間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我認為，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中國和美國代表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是當今世界上最要重的兩種力量。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西方要向中國學習。最重要的是，雙方都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儘量避免衝突。我深深知道如果中美兩國發生衝突，那對全世界，全人類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我一直都很欽佩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貢獻。我希望更多的美國人與我有同樣的認識。我希望中國人，(也許我一個美國人提出這點有一點不合適)也要更多地認識到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的偉大。據我所知，現在似乎有些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覺得不屑一顧。

李：當今世界有一種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全球化不意味著要使不同的文化歸於一統，使不同的文化失掉其固有的特徵，或削弱每個人對自己文化的忠誠和熱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要做的就是開闊我們的心胸，認真向其他文化學習，和不同文化的人平等對話，共創一個和諧包容的世界。這是我希望的未來。

李：我也希望如此。世界如果您像您所說的那樣發展，那就太好了。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謝謝您的時間。

吳：謝謝你。(原載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外漢語教學動態》)